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6.06.018

# 西汉中期修辞举隅

## ——以《盐铁论》为例

宫丽影

(太原师范学院 公共外语部, 山西 太原 030012)

**摘要:**《盐铁论》体现了西汉中期丰富的修辞案例和修辞策略。辩论双方均在多处使用诉诸人品和类比的修辞手段,而“正名”“阴阳”和“法古”等概念既被儒生用来提出修辞发明,也被大夫用来反诘儒生。双方熟练地从百家思想概念提出自己的修辞发明,体现了西汉中期各家学说的汇通和融合。

**关键词:**修辞批评;《盐铁论》;西汉中期;正名;阴阳;法古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16)06-0105-06

《盐铁论》由西汉的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整理撰写而成,记述了汉昭帝时期围绕汉武帝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政策的一场大辩论。《盐铁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辩论记录。这场辩论不仅影响了儒生们个人政治地位的沉浮变幻,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地位。

围绕《盐铁论》的研究中,主要方向包括文学特征、政治思想、经济政策等方面<sup>[1]36</sup>。刘亚猛(LIU Yameng)提出,不应仅仅用传统的哲学视角或语言视角去看中国古代百家思想。他认为,完全可以用一种修辞视角去研究<sup>[2]182</sup>。然而,就《盐铁论》而言,从修辞角度进行的研究并不多,仅见于林平和与游晓晔(YOU Xiaoye)等少数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林平和研究了《盐铁论》中的修辞,重点关注修辞格,例如对偶、排比、层递、顶真等<sup>[3]</sup>,但是分析的视野有所局限。作为美国的大学教授,游晓晔(YOU Xiaoye)研究了《盐铁论》中的修辞,但他是从美国修辞教育为出发点,指出美国修辞学界应该了解和认识希腊罗马修辞之外的修辞传统,从《盐铁论》的双方论辩中吸取开明的人文素质,进行跨文化、跨国界的对话<sup>[4]367</sup>。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研究以《盐铁论》为代表的西汉修辞传统、探索西汉学者如何吸纳前代的修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了解历史,无非是了解我们自己。”<sup>[5]</sup>因此,有必要对《盐铁论》进行修辞批评,探究西汉中期的修辞传统。

### 一、背景

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在公元前 81 年,下诏将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聚集到京城,召开会议,了解民间的疾苦。在这次会议上,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一方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一方,互相辩论得非常激烈。贤良文学们请求废除盐、铁和酒的官营,并取消均输官,而桑弘羊一方则是极力为之辩护。均输和平准是汉武帝时期干预市场和调节物价的手段。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所纳的贡物都换算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采买,便利输送,调节物价,同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平抑京城和大城市的物价,贱时收买,贵时抛售,从而打击投机,稳定物价。

国内许多学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随后若干年内,都把大夫定义为法家<sup>[1]41</sup>。游晓晔(YOU Xiaoye)也借鉴国内学者的说法,称之为法家<sup>[4]368</sup>。然而,虽然大夫阶层推崇商鞅,尊其为师,但并不等于大夫就是纯粹的法家。本文中对大夫所代表的思想流派不做定义,理由是历经多次残酷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之后,西汉中期的儒家、法家和黄老之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都有一定分量,不能完全排除彼

收稿日期: 2016-05-13

基金项目: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外研社外汉翻译教学研究基金第一批中标项目《修辞学》(17)

作者简介: 宫丽影(1979-),女,吉林白城人,太原师范学院公共外语部讲师,文学硕士。

此, 所以不对他们做具体的思想流派划分。总之, 大夫和他们的对手贤良文学或儒生们(下文统称儒生)都是西汉中期最有影响力的论辩选手, 代表着当时的论辩修辞水平和风格。

论辩一开始, 双方就充分展示了各自的观点, 儒生指责盐铁酒官营、均输和平准都是与民争利, 此类政策让人们舍本逐末, 滋长了贪欲。在他们口中, 农业是本, 而工商业都是末, 如果农业没有足够的产品, 人民必然受饥寒。因此, 他们主张废除官营, 重农抑商。大夫指出, 匈奴不断袭扰汉朝, 鉴于此, 武帝加强防御, 屯兵戍边, 而军事活动的经费要来自盐铁酒官营以及均输和平准。如果废除这些制度, 军费无从筹措, 边防无法整肃, 因此官营制度不能废除。为了进一步阐释各自的观点, 攻击对方, 双方开展了多轮较量, 使用了多种修辞策略。下文将选取《本义》《论儒》《轻重》《散不足》《水旱》《备胡》和《和亲》共 7 个章节重点研读, 展开分析并且探究修辞背后的思想史因素。

## 二、修辞策略举例及分析

### (一) 儒生挪用“正名”

“正名”历来被视为儒家话语中的重要概念, 不仅关涉语言本身, 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孔子在《论语》中说过的这句话被汉代儒生文学以及后世反复引用:

子路曰: “卫君待子为政, 子将奚先?” 子曰: “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 “有是哉, 子之迂也! 奚其正?” 子曰: “野哉, 由也! 君子于其所不知, 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 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 无所苟而已矣。”<sup>[6]143</sup>

孔子说这段话的时候, 面对卫国当时混乱的政局, 他希望通过名的规约, 实现有序、协调的社会。后来, 这段话被频频用于构造修辞发明(invention)。

《盐铁论》中, 大夫指出: “伊尹以割烹事汤, 百里以饭牛要穆公, 始为苟合, 信然与之霸王, 如此, 何言不从? 何道不行? 故商君以王道说孝公, 不用, 即以强国之道, 卒以就功。邹子以儒术干世主, 不用, 即以变化始终之论, 卒以显名。故马效千里, 不必胡、代; 士贵成功, 不必文辞。”<sup>[7]87</sup> 所以人们应学习古代的伊尹、百里奚、邹衍等人, 经权结合, 最终强国利民, 实现仁义。然而, 儒生固守儒家观念, 不善变通, 孔子和孟子都是坏榜样, 要么是“守旧术”, 要么是“能方不能圆”, 守旧而僵化, 不知道殊途同归的道理, 分别困于梁宋和饥于黎丘。针对大夫对儒家先贤们的指责, 儒生文学马上拿出“正名”的大旗:

文学曰: “伊尹之干汤, 知圣主也。百里之归秦, 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主, 其册素形于己, 非暗而以冥冥决事也。孔子曰: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sup>[7]89</sup>

儒生文学回避了历史上伊尹和百里奚曾经分别通过“苟合”(低贱的做法)来博取君主认同的争议话题, 坚持认为二人是长期以来怀抱着各自的“册(策)”, 分别去找明君, 绝不是糊里糊涂做事, 但是他们的“正名”和孔子的“正名”并不是一回事。从形式上看, 他们的逻辑可以表达如下。

大前提: 名不正, 言不顺, 则事不成,

小前提: 二人的事成了(大夫已详述, 故省略),

结论: 所以不存在名不正或言不顺的问题, 他们不存在背弃自己节操的事情。

儒生的说法构成了一个最普通的修辞式推论(三段论的一种)。儒生挪用孔子原本用于规约人伦、王纲的“正名”, 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逻辑支持。

类似的策略, 在《孟子》中也有体现, 当时齐宣王问孟子关于汤流放夏桀、武王伐纣的合法性, 原文:

齐宣王问曰: “汤放桀, 武王伐纣, 有诸?” 孟子对曰: “于传有之。” 曰: “臣弑其君, 可乎?” 曰: “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 未闻弑君也。”<sup>[6]221</sup>

孟子的回答同样是采用“正名”策略, 通过引入“贼”“残”“一夫”等概念, 使弑君的三段论

崩溃。

大前提：臣杀君为弑，

小前提：汤、武曾经分别流放桀和杀掉纣，

结论：因此，汤、武曾弑君。

然而，孟子说这里汤和武对付的是“贼”和“残”，是独夫民贼，所以小前提失效，三段论崩溃，不能说汤、武弑君。

同样是把“正名”用在三段论中，大夫与孟子略有不同，孟子是替换概念，而大夫用是借助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念。大夫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概念、孟子的修辞策略，而且丰富了修辞策略的表现形式。

### （二）大夫攻击匈奴人品，而儒生坚持修仁政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记载，匈奴是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始于公元前5世纪。从那时起，他们就不断袭扰北方各地，迫使当时的各国修建长城。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在中亚地区形成部落联盟，实力不断壮大，开始威胁到中原王朝。尽管从秦始皇开始加固、连接长城，抵御匈奴，但是面对强大的匈奴，长城也只能减缓并不能消除匈奴祸患。汉朝初年，由于国力贫弱，历任皇帝被迫使用和亲的策略与之周旋。到了汉武帝时代，凭借一系列经济和军事政策，积累了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采取主动出击，收复失地。

在盐铁这场辩论中，大夫历数匈奴的罪恶，攻击匈奴的人品，力图证明只能与之兵戎相见。在《本议第一》中，大夫指出，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导致的结果是“边人之久患”，并且“为虏所系获”；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sup>[7]2</sup>，以此证明匈奴是一支不能忽视的力量。

随后，大夫说：“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sup>[7]314</sup> 这些做法表明匈奴道德败坏，不仅不感恩戴德，反而变本加厉。大夫在论述无法与匈奴建立和约时，对其道德人品的指责达到了最高峰：

自春秋诸夏之君，会聚相结，三会之后，乖疑相从，伐战不止；六国从亲，冠带相接，然未尝有坚约。况禽兽之国乎！……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贪侵盗驱，长诈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备，亲之以德，亦难矣。<sup>[7]348</sup>

大夫将之比喻为“禽兽之国”，彻底否定其做人的尊严。既然这是一群禽兽，那么汉朝也就没有与之建立和约的可能和必要了，体现出种族中心主义的心态。

面对大夫的观点，儒生并没有回应是否应该反击侵略，没有回应匈奴的人品道德是否好，而是说应该向周公一样，从庙堂(国家层面)施行“仁政”、修文德，有了仁政，自然不用打仗，自然近者亲附远者悦服，无敌天下；认为和亲的时候，双方关系好，人民负担轻，后来开战，人民负担重，却不回应大夫所说的不守信用、屡犯边境、诡诈劫掠、背叛盟约等要点。

儒生看待匈奴的方式与大夫迥然不同，不仅仅是由于辩论的需要，而且来自儒家“仁”的学说。儒家的“仁”是一种从血缘亲情生发出来的性情，可以从内到外逐层推衍，进而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礼”的秩序能得到自觉遵从，“名”的象征能得到长久稳定的保证<sup>[8]96</sup>。他们认为，匈奴并不是大夫所塑造的那个形象，他们也完全可以被修文德、施仁政的汉代版周公感化，进而向往汉朝，与之交好。

儒生对匈奴的认知和态度在以后的历史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投降主义路线<sup>[9]</sup>，但是游晓晔(YOU Xiaoye)认为，儒家这种观点经过文学等儒生反复提倡，消解着大夫代表的种族中心主义，一定程度上体现(或者迎合)了汉朝逐渐走向帝国的客观需求<sup>[4]380</sup>。

### （三）大夫和儒生文学均大量使用类比

大夫指出，“水有獭獭而池鱼劳，国有强御而齐民消，故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夫理

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宇”<sup>[7]105</sup>。用“獭獭”与“池鱼”的关系来类比国内豪强势力和百姓的关系；然后进一步用类比，用“茂林”与“丰草”、“大块”和“美苗”的关系来加强自己的观点——为政者必须铲除这些豪强势力，才能治理国家，让百姓各自安居乐业。

儒生也不示弱，使用医生诊断治疗来类比国家治理。针对其中提到的阴阳之说，游晓晔(YOU Xiaoye)认为这里的阴阳之说是一种修辞策略<sup>[4]380</sup>，但是这里的原文只是一笔带过，“阴阳”并没有构成“医生治疗犹如国家治理”这个类比的要件。文学说，扁鹊等高明的医生懂得阳寒、气血等道理，适当地调和，为人诊治；而拙劣的医生胡乱操作，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如今国家治理得更糟糕了，说明扎针(治理国家)的人不如扁鹊高明，因而必须废掉盐铁官营等一系列政策。类比的运用在《盐铁论》中俯拾皆是，而且双方使用类比的频次都很高。

#### (四) 阴阳

论辩过程中，阴阳以一种认知方式被用于修辞发明。场合之一是《水旱第三十六》，其中大夫指出，水旱是阴阳更替、此消彼长的产物，不以人的意志、德行为转移：

大夫曰：“禹、汤圣主，后稷、伊尹贤相也，而有水旱之灾。水旱，天之所为，饥穰，阴阳之运也，非人力。故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天道然，殆非独有司之罪也。”<sup>[7]273</sup>

上文中大夫已经明确指出，即便是禹、汤等古圣先贤时代，也有水旱饥谨，但是儒生既不对大夫列举的事实作出回应，也不对“阴阳”之说作出认知上的回应。事实上，这是大夫对儒生的一种主动出击，直接挑战儒生董仲舒的阴阳灾异说。按照董仲舒的观点，“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sup>[10]</sup>。如果君主无道、政令失误、不行仁义，结果肯定是天降灾异，然而尧舜禹汤时代也有水旱饥谨，表明灾害是阴阳之运，不以人的主观活动为转移。因此，如果儒生在这里回应了事实，回应了阴阳之说，他们必然陷于自相矛盾，于是，他们只能另找两条应对策略。

第一，儒生只是自顾自地讲述古代的时候，帝王修文德，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儒生的做法类似董仲舒，把灾荒视为天对恶政的感应，而将风调雨顺视为德政的对应物：

古者，政有德，则阴阳调，星辰理，风雨时。故行修于内，声闻于外，为善于下，福应于天。周公载纪而天下太平，国无夭伤，岁无荒年。<sup>[7]274</sup>

第二，儒生没有对大夫的阴阳说进行认知上的还击，却用了是诉诸人品的手段，认为大夫推卸责任，不反省造成灾荒的真正原因，却将无德之政导致的天灾归于“阴阳之运”，而且把推卸责任的程度上升到以兵刃杀人的高度：

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阴阳之运也’，非所闻也。孟子曰：‘野有饿殍，不知收也；狗食人食，不知检也；为民父母，民饥而死，则曰，非我也，岁也，何异乎以刃杀之，则曰，非我也，兵也？’<sup>[7]275</sup>

#### (五) 儒生与大夫分别诉诸“古”

在论辩过程中，儒生不断诉诸“古”，认为上古时代的尧、舜、禹、汤和周公是榜样，后来的社会问题都是因为背离了他们的路线所导致的，解决之道就是回归古代圣王的路线，法先王，施仁政，修文德。具体而言就是废弃官营制度。

反对大夫对匈奴的叙述时，儒生指出：“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又引用孔子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儒生认为匈奴可以受到礼乐德政召唤，进而归服。

随后，在《散不足第二十九》中，儒生从宫室、舆马、衣服、器械、饮食、声色、玩好等 7 个方面，分别在 32 个项目上展开叙述，探索他们心中的古代理想社会。段落一律以“古者”起头，讲述古代多么美好，继而讲“今”，说明今天如何不如往昔。

在对匈奴用兵的问题上，大夫也经常诉诸“古”，不仅提到古代的做法，而且提到《春秋》对这种事情的态度：

大夫曰：“古者，明王讨暴卫弱，定倾扶危。卫弱扶危，则小国之君悦；讨暴定倾，则无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是以黎民委敌也。春秋贬诸侯之后，刺不卒戍。行役戍备，自古有之，非独今也。”<sup>[7]290</sup>

大夫说，孔子在《春秋》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是如此：该征伐就征伐，不去的，就应受到贬斥。况且，这种事情自古就有，不是今天独有。可以说，大夫诉诸“古”，目的是反诘儒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至此，儒生只能拿征伐的代价巨大来说事。

总体上看，儒生将过去塑造成完美政治、天下大同的手法由来已久，早在《孟子·离娄章句上》里就反复提到古代“先王之法”，认为“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sup>[11]</sup>，将其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儒生把董仲舒的奉天法古思想牢牢攥在手里。葛兆光指出，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下，历史知识变成了历史哲学，历史记忆在此时取代了实存的历史<sup>[8]261</sup>，他们反复拿儒家意识形态化的典籍(例如《春秋》等)论事，论证自己学说的合法性。大夫谈“古”，则是为了反驳儒生。

### 三、讨论

从对比的角度看，盐铁论战中很常见的诉诸人品和类比的修辞手段不是中国独有，二者在古希腊的修辞传统中也有表现，例如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就提到类比手段<sup>[12]15</sup>，也讨论过诉诸人品的手段<sup>[12]253</sup>。论战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策略是“正名”“法古”和“阴阳说”。儒生挪用“正名”和提倡“法古”以及阴阳的修辞策略可以从西汉中期的思想史和修辞学中的修辞情境理论得到解释。西汉中期，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合流。君主掌握了世俗权力和精神世界的话语权，儒生也成了君主的臣下<sup>[9]269</sup>。为了争取话语权和谋求政治地位，董仲舒等儒生不得不寻找有利于他们的修辞发明。

袁影的修辞情境理论认为，修辞情境中的修辞者表现出“意图”和“角色意识”两种属性或者两种核心成分，意图的种类大致为取悦、传授/说明、说服/打动。角色意识主要是体现身份的社会角色，包括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受众角色的认知以及双方角色的认知<sup>[13]</sup>。双方角色是一种角色关系或者权力关系。盐铁论会议上，无论皇帝是否在场，他都是这个修辞事件的主要受众。儒生在辩论过程中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说服皇帝，取消盐铁官营政策。他们对自己的角色有清晰的认识，知道自己受制于权力关系，难以获得平等的话语权，所以他们只能寻求超越“天子”这种世俗兼精神领袖的规则或实体。一种是孔子的“正名”，即必须承认“名”的规约性，在名的规约下做符合礼的事情，施行仁义，皇帝也概莫能外。第二种是法古。“古”存在于儒家意识形态化的典籍中，例如《春秋》等。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古”承载着超越帝王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儒生企图借“古”为帝王勾画出道德、伦理范围，例如东汉的光武帝和汉明帝等就曾遵循儒家礼仪制度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sup>[8]272</sup>。第三种是阴阳灾异说。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帝王之上还有“天”，它会对现世表现出各种征兆、祥瑞和灾异分别对应仁德之政和无道暴政。为了树立自己的话语权，儒生借阴阳灾异说来构建自己的修辞发明。

刘亚猛(LIU Yameng)<sup>[2]148</sup>认为诸子百家有许多共同的理论前提、价值观、标准和术语。这一点在西汉中期表现更为明显，在盐铁论战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大夫主要依仗法家，尊商君(鞅)为师，但是他们对儒生引述的“法古”“阴阳灾异”概念非常清楚，甚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儒生对“阴阳”、黄老之学的熟练运用则表现出他们对其他学派概念的深刻了解。这种彼此汇通的态势前所未有的，表明西汉中期的思想史发展方向是汇通和融合，而不是罢黜或独尊的结果。

总之，对《盐铁论》的修辞批评表明，中国西汉时期的口头论辩中，双方不仅使用一些与古希腊传统相通的手段，而且使用“正名”“阴阳”和“法古”等中国特有的概念来构筑自己修辞发明，从而实现说服帝王的目的。大夫和儒生们使用这些概念的熟练程度也表明此时的思想趋于汇通和融合。

### 参考文献：

- [1] 龙文玲.《盐铁论》研究综述[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12(1):36-44.
- [2] LIU Yameng.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if the Speech Does Not Sound Agreeable: Rhetoric and the Invention

- of Classical Chinese Discourse[M]// LIPSON C, ROBERTA A, BINKEY. Rhetoric Before and Beyond the Greeks. New York: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147-182.
- [3] 林平和.《盐铁论》修辞之研究[J].“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人文学报,1986(4):10-15.
- [4] YOU Xiaoye. Building Empire Through Argumentation: Debating Salt and Iron in Western Han China[J]. College English, 2010(4):367-384.
- [5] HEIDEGGER M. Plato's Sophist[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7:7.
- [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7] 马非百.《盐铁论》简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8]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 [9] 梁效.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J].红旗杂志,1974(5):12-19.
- [10]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 2012:259.
- [11] 孟子.孟子·离娄章句: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125.
- [12]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蓝纯,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 [13] 袁影.修辞批评新模式构建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66.

## Rhetorical Tradition in the Middle of Western Han Dynasty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as an Example

GONG Liying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Taiyuan Teachers' College, Taiyuan, Shanxi 0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rhetorical criticism of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reveals the rich rhetorical scenarios and rhetorical strategies prevalent during the middle of Western Han Dynasty. Both Confucian literati and officials resorted to the strategies such as ethos appeal and analogy. Concepts such as the rectification of names, *yin* and *yang* and the worship of following examples of the ancients were used by Confucian literati to raise their rhetorical invention, but also by officials to rebuke their opponents. That both parties put forward their rhetorical invention relatively on a good mastery of the ideas of different schools indicates the convergence of these ideas of the schools during the middl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 rhetorical criticism;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the middl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rectification of names; *yin* and *yang*; worship of following examples of the ancients

(责任编辑: 耿春红 英文校对: 杨 敏)